

□ 本期特稿

# 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

王记录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和治史观念来看,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和系统完整的史学话语体系;精英史学重视思想独立,富有批判精神,有着与主流史学差别甚大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大众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社会大众均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三种史学形态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主宰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出,并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三种史学形态都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主流史学要想继续保持主流地位,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形成不同学派,张扬其理论的个性力量,与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互动;精英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学术流派渐趋形成,个性化研究日渐凸显,不断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解释框架,逐渐引领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大众史学发展迅速,影响日大,但乱象不断,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需要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学形态;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大众史学;学派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2-0001-10

**作者简介:**王记录(1964—),男,河南范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的研究。

怎样认识当代中国史学,当代中国史学与以往的史学有什么不同,它们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着,这些不同形态的史学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其演化发展的趋向如何,这是研究中国当代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以为,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革与发展,当代中国史学的话语形式、学风、研究内容、治史风格、治史目的等诸多方面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存在状态也渐渐分化,逐步演化为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的史学形态。三种史学形态的内涵、精神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架构起当代中国史学的基本风貌。

貌。

研究史学史,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对史学形态——也就是史学的存在状态——的描述,比如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学术界常常使用“封建史学”“新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主义史学”“唯心主义史学”等概念来概括某一种史学形态,并赋予它特有的内涵、宗旨、风格等。显然,这样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那么,反观当代中国史学形态,还

收稿日期:2014-02-08

能否再用这些概念来概括呢？显然不能。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唯物史观在历史学领域普遍运用，“封建史学”“资产阶级史学”“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从什么角度来恰切地描述当代中国史学形态，就成了剖析当代中国史学的面貌、发展态势及本质的关键所在。

史学形态虽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又是认识者根据不同的认识标准进行的理论概括，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相统一的结果，其本质是为了获得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角度，把史学的存在状态揭示出来。划分史学形态，可以采用多种方法，依据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认知。通过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深入分析，我们侧重于从历史书写的目的性及治史观念的差异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史学的存在形态，并把外在的编纂形式、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作为参照。由此入手，我们认为当代中国史学存在着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三种主要形态，其内涵和特质各不相同，但又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主流史学（或称主导史学），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建构起来的史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主流史学的基调是弘扬“主旋律”，表达的是统治者的历史话语，其目的是以维护国家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为主，研究历史是为了说明现行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或者说，统治者通过主流史学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并把对历史的解释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主导或引导人们对历史的看法。通过特有的历史书写内容来教育全体民众，从而形成全民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形态化非常明显。主流史学往往和权力结盟，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意识和直接的政治实践功能，可以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学术资源自上而下地向人们灌输某种历史观念，“建立一种‘政治——学术’模式，即通过历史研究这样的学术性行为来隐蔽地表达政治意图，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使史学能够更好地为现行政治服务”<sup>[1]159</sup>。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语境中，主流史学显然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封闭到开放、由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立到对话的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并形成了从历史观、研究内容、对历史诠释和解读方式直到历史编纂框架等诸要素在内的系统的对历史的认知模式，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史学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

以来，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中的优秀的思想遗产和历史进程相结合，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当今中国史学的主流。这个主流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在历史观上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在研究风格上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从世界范围来看，这可以说是当代历史学的中国学派”<sup>[2]</sup>。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从理论到方法，从思路到话题，都已经标准化、程式化了”<sup>[3]</sup>。

所谓精英史学，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记述内容的角度来理解，指那种反映“精英人物”的政治、军事活动的史学。从史学史的角度看，这种史学由来已久，在历史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外历史书写几乎都眼光向上，把帝王将相等“精英人物”置于历史活动舞台的中心，以至于形成了“英雄史观”这样的历史观念。一种是从撰述主体的角度来理解，指由“知识精英”撰述的史学。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批富有“精神关怀”和“技术关怀”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等知识精英，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独特的精神寄托和心灵诉求，或建立庞大的思想体系，或开启全新的思维方式，或贡献宝贵的知识财富，影响人类社会甚巨。具体到史学领域，精英史学当然就是精英史家撰述、传播和分享的史学。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精英史家”是指史学工作者中那些思想独立、见解独到的优秀分子，精英史学自然是指作为精英史家的史学工作者创作的历史作品及其史学旨趣。从著史的目的性上看，精英史学往往以天下为己任，注重对历史文化的反思、赓续和革新，存疑考信，张扬历史见解的深刻与独特，侧重于知识阶层的历史表达，自觉承担着社会教化、批判和启蒙的使命，是“经典”的独特解释者和传播者。在史学思想上，精英史学并不主动与意识形态结盟，它更注重宣扬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追求对历史独立的思考和解释，在历史研究方面更注重“社会批判”，通过自己的“批判性研究，让政治家从中看到存在的问题，看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sup>[4]</sup>。精英史学重视对人格尊严、生命价值和学术自由的培育，对人类的生存怀有忧患之心。在学术价值上，精英史学更强调求真，往往旁征博引，立论高深，追求学术价值的永恒和理论创造的精深，致力于学术的原创、承继和发展。在历史书写的态度上，体现的是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表达的是个性化的历史见解和审美情趣。精英史家的思想来源比

较复杂,既秉承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和近代史家“求真致用”的气质和理想,又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思想,融会贯通,自成一统。他们以国家民族为担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方面,在吸收西方优秀文化为我所用方面,在繁荣新中国历史研究方面,在构筑不同的历史研究范式方面,都卓有建树。

在当代中国,“大众史学”又常常被称为“通俗史学”“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它有一个逐步发展到形成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在表达这一概念时使用最多的词汇是“历史知识的普及”,它只是史学的一个附属,没有任何独立的学科特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通俗史学”一词才出现。它主要强调历史的表述方式,即运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语言,用优美的文笔把历史知识描述得富有趣味,以使民众可以轻松愉快地理解和接受,从而达到普及历史知识的目的。几乎同时,“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三个词在史学界也出现了。这三个词都源自美国的“Public History”,只是译法不同而已。和“通俗史学”不同,“大众史学”的含义更为丰富。台湾学者周櫟楷这样定义“大众史学”：“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人人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和观点表述私领域或公领域的历史。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大众阅读。”<sup>[5]</sup><sup>27</sup>很明显,大众史学强调史学的普及和应用,突出历史书写者的个人立场、个性化和社会服务性。首先,大众史学的书写主体是大众,书写的是大众关注的历史,其服务主体更是大众。它凸显了“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观念,打破了职业史学家垄断历史写作的局面。它使用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话语系统,描述大众自身或大众感兴趣的历史,为大众提供历史知识。其次,大众史学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于与历史相关的现实社会各领域,强调史学在公共领域(如历史遗址、博物馆、旅游景区、政府部门、公司企业、新闻媒体等)的应用。“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追求,而是必须为满足现实的需求提供线索和答案”<sup>[6]</sup>。一句话,这种史学形态注重历史知识在民众中的传播和历史的实用价值,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参与历史。在当代中国,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大众史学恰恰体现了这种特点,其生产者和参与者已不单单是职业的历史学家,更多的是其他领域的人员。大众史学利用历史研究参与社会创造的能力越来越强,历史越来越走进大众的社会生活和

文化生活<sup>[7]</sup>。

我们深知,任何一种划分都会存在它的局限性,但同时又有它的有效性。我们侧重于从治史目的性的角度将当代中国史学区分为三种史学形态,较之于从历史写作主体、历史编纂形式等其他特性作出划分,更具有合理性。因为目的是人类实践的最终(或最高)要求,同样,历史撰述的目的也是历史撰述实践的最终(或最高)要求。在划分不同的史学形态时,我们既承认“特质”,又承认“联系”。事实上,这三种史学形态之间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其交融和交叉也是明显的。精英史学的启蒙性、批判性、重视学术的承继与发展在主流史学中时隐时现;主流史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在精英史学中同样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以历史知识应用为目的的大众史学也同样深受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的影响。三种史学形态既相互对立、相互质疑,又在相当程度上和范围内相互交融和杂糅,具有某种相互制约和转化的辩证关系。就当下来讲,其创作主体也大体都是精英史家。之所以这样划分,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史学的内涵和表征而采取的一种方法,为我们判断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不同发展时期的当代中国史学复杂多元、繁复变化的表现形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对于把握当代中国史学不同形态之间的分合、转换和嬗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 二

作为当代中国的三种主要史学形态,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建构起了当代中国史学的生态语境和价值体系标准。由于三种史学形态在研究目的、思维范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将三者置于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性界域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三者之间有一个逐渐分离、发展、争斗和借鉴的过程,此消彼长,共同描绘了当代中国史学多姿多彩的图画,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当代中国三大史学形态之间关系的嬗变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949年到1979年为第一阶段,总体特征是主流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宰史坛,从各个方面支配着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的史学观念。1980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总体特征是史学走出了理论匮乏、单调、僵化的怪圈,主流史学面临考验,精英史学不断崛起,大众史学异军突出。在研究方法、研究取向、学科理论和表述方式等方面逐步呈现多元发展的态势,三种史学形态呈现鼎足而立的

局面。

(一)史学形态一枝独秀,主流史学主宰史坛(1949—1979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种学术,都面临重新改造的命运。1949年前就已经产生并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国家体制力量的支撑,借助与意识形态的合作,在中国史坛取得了绝对支配地位,正像学者们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占绝对统治地位”<sup>[8]</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国人民思想的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sup>[9]</sup>。而民国时期孕育的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在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前,很快由中心走向边缘,几乎丧失了存在的资格。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如火如荼,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史学家,“被视为‘封建文人’、‘资产阶级学者’、‘旧式学者’,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成为被改造的对象”<sup>[10]126-127</sup>。他们都要经过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或自觉或被迫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这样的政治氛围笼罩下,学风、语境、问题甚至人心都处在巨大调整之中,学术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史学形态也因此发生了巨大改变。

首先,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过程中,精英史学的治史理念和个性化表达方式、旧知识分子的人格和思想均受到沉重打击。所有史学家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都被纳入主流史学的体系之中,在左倾思想的支配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史学思想。

从1949年到1958年,对旧知识分子的改造效果显著,“通过这一系列的运动和学习,大家都有极大的进步,立场、观点和方法都初步地改变过来,初步地以工人阶级的立场、唯物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来讲授和撰著历史了”<sup>[11]</sup>。处于崭新的时代,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或幡然醒悟,或遗世独立,或艰难改造,诸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人,都选择了不同的生存路径<sup>[10]131</sup>。这些从旧中国走过来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试图适应新的时代及思想要求,反省以往的学术立场,调整自己的治学路数。这一代史家在外在的政治高压和内在

的自觉改造的合力作用下,逐步被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同化。

然而,随着政治对史学干预愈来愈烈,1958年,又掀起一场“史学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不仅使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再次受创,而且使主流史学阵营内部出现分化,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受到批判,“史学研究从此开始,几乎完全、彻底地丧失了作为一门学问所应有的独立地位,沦为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婢女”<sup>[10]131</sup>。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政治之手毫无顾忌地拨弄史学之弦,在中国史学史上弹奏了一支单调、刺耳且充满血腥的曲子。实际上,“文革”时期,作为治史底线的一切东西都被政治之手拆除,“文革史学”已经全然是政治,不再是史学。这一时期,不仅精英史学不复存在,就是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被邪恶政治强奸,纯洁之身亦不复存在。

其次,大众史学被纳入主流史学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历史观受主流史学支配。当时学术界尚没有出现“通俗史学”或“大众史学”的概念,也不存在大众自己对历史的多彩解读,更遑论学科特性,仅仅是历史知识的通俗化普及。吴晗等人编撰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充分体现了从1949年到1979年间历史知识普及的价值取向。

从指导思想上看,“小丛书”自觉贯彻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吴晗在《论历史知识的普及》一文中谈到“小丛书”的编撰,说:“我们遵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识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农民战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学习了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sup>[12]162-163</sup>他在总结编写小丛书的经验时说:“我们的经验,几年来总结了几次,总结只有8个大字,曰:‘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此外,没有了。”<sup>[12]172</sup>很显然,吴晗自觉地把通俗史学工作纳入主流史学的话语体系中,这里的历史通俗读物的写作,完全是受意识形态的支配,或者说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从编写原则上看,除突出“史实准确,文字通俗,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外,还与主流史学步调一致,运用唯物史观,宣传唯物史观。“《中国历史小丛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问题,在普及历史知识的同时,还承载着宣传唯物史观的任务”,“把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和宣传新的历史观视为自己的责任”<sup>[13]</sup>。可见,大众史学自觉站在主流史学一边,承担着相同的宣传唯物史观的使命。

总之,从1949年到197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依靠国家的力量,自觉与意

意识形态结盟,无可争议地成为历史学界的主宰。这一时期,精英史学、大众史学的治史立场、观点和方法都被统一到主流史学上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历史科学里的绝对地位确立了”<sup>[12]163</sup>。当时的史学家,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历史研究的圭臬,视为唯一正确的理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在判断历史问题时就会犯错误”<sup>[12]183</sup>。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背景下,精英史学的个性化和大众史学的多彩表述不复存在了。

(二)思想解放日趋深入,史学形态三足鼎立(1980至今)

随着“文革”结束及改革开放的到来,史学领域一扫沉闷压抑的阴霾,开始焕发朝气,诸多问题得以正常讨论,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下的史学形态也开始逐渐分野,慢慢显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就人自身来说,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步增强。“历史研究工作者作为敏感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个群体,自主性、独立性也逐步地并显著地增强了,而且带有创造文化的知识分子的特性”<sup>[14]</sup>。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以往长期教条、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做法进行反思,并积极探寻史学发展之路。从1979年到1989年,历史学领域以反思批判为基调,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冲击下,在“史学危机”的迷茫中,对历史研究的最根本的问题——理论与方法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尤为重要的是,历史学工作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进行重新认识,削足适履、删改扭曲中国历史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做法受到批评,正本清源,重新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潮流。经过史学界的热烈讨论,“人们在史学理论上取得了这样一个共识: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代替史学理论,历史学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专业理论”<sup>[15]</sup>。显而易见,史学研究者认识到中国史学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必须自觉摆脱意识形态化,还其学术研究的本来面目。总之,20世纪80年代,在史学研究领域,摆脱教条主义的羁绊成为潮流,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历史的局面被逐步打破。在这股思想解放和理论解放的潮流之下,历史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步消解,学术话语体系逐步

建立,话语体系的逐步改变使主流史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悄然发生了改变,史学工作者认识历史的自主性、独立性逐渐显露,探寻史学真谛的勇气得以彰显。虽然这一时期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还没有显示出自己的学术个性,无法与主流史学分庭抗礼,但三种史学形态开始分化的迹象因为史学理论僵化局面的被打破而初露端倪。

“史学界的多元化格局,是1990年代才形成的”<sup>[10]149</sup>。随着历史研究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这三种史学形态的分化逐步显现,并在新世纪成三足鼎立之势。

就主流史学而言,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与文化思潮的进一步变革,学术话语及学风进一步转化,当代中国的学术版图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到90年代的“国学热”,以前被边缘化的史学家,诸如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人,其治学方法及治学精神成为人们备加推崇的对象,并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地位。而原来一统天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不断遭受冷落,面临严峻的考验。其代表性史家如郭沫若等人的治史成就更是受到质疑。正如有些学者所云:“如果说1949年后至8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历史学的象征的话,90年代的偶像则变为陈寅恪、王国维等‘国学大师’。”<sup>[10]203</sup>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各种史学思潮的冲击下,“正面临、正经历一场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sup>[16]312</sup>。以唯物史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模式的合理性遭到质疑,甚至有人把具有良好学术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做出更大成就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统天下,并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sup>[17]</sup>。有些学者还提出了“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史学由原来的一统天下到如今被认为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一派”,反差之大,前所未有。毋庸置疑,新中国成立以来即居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尴尬。

与主流史学的命运相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史学的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其个性日益凸显。随着史学研究多元化的到来,学术界众生鼓噪,热闹非凡,“正在崛起的民间话语、民间学术正在向主流话语、主流学术挑战,争夺资源”<sup>[16]314</sup>。此时的精英史学亮出了鲜明的旗帜,声称不以任何“书本”或任何“权威”的论断为准绳,而是以自己的判断为

准则,“不唯上、不唯书、不泥古、不趋时。既不作传统观念的奴隶,又不作流行观念的牺牲品”<sup>[18]</sup>。他们反对拒斥异见、武断塞蔽,主张宽容多元、百家争鸣,“拒斥异见,则必流于武断塞蔽,终使学术枯萎衰竭;众说争鸣,有望走向宽容多元,终使学术健康昌明”<sup>[19]</sup>编辑人语。精英史学的学术评判标准和话语系统与主流史学的差别进一步显现。精英史家并不反对唯物史观,但也认为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之上的理论,他们认为在历史研究上,所有有助于解决历史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在地位上都应该是平等的。譬如,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吴承明提出了“史无定法”的观点。在他看来,运用任何一种单一模式或单一理论研究历史都不可取,他主张“史无定法”,“不同问题可用不同方法,同一问题也可用多种方法来论证”<sup>[20]</sup>。从事清末民初思想史研究的罗志田“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并提出“史无定向”的思想,认为历史研究中思路和视角“定于一”弊端甚多,“边界明晰的学族认同原本不是治史的先决条件,我倒倾向于相对宽泛的从各种方向或角度看问题”<sup>[21]</sup>。王学典等人认为“史无定法”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它祛除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或经济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属性,将它们统统还原为从事历史分析的工具,“历史学将有可能从此走向没有意识形态重负的自由之路上”<sup>[10]217</sup>。这一时期的精英史学不仅在理论上张扬学术个性,而且有着深入的历史研究实践,在文化史、社会史等研究领域,发挥自身特长,展示风格各异的对历史的解释。

就大众史学而言,进入 1990 年代,“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等概念相继出现,标志着历史知识的普及和应用已经开始向学科建设迈进。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如黄留珠、瞿林东等人开始从学理上探讨通俗史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赋予通俗史学前所未有的价值和意义。还有一些学者如彭卫、李小树、周朝民等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对通俗史学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进一步赋予通俗史学以学科史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源自美国的“大众史学”(公共史学、公众史学)也被人介绍到中国,并逐步引起史学界重视,摸索着建立中国式的大众史学的学科框架<sup>[22]</sup>。所有这些,都使大众史学在理论上获得了与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分庭抗礼的资格。与此同时,大众史学的创作和实践也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局面。尽管在浓重的商业背景下,大众史学作品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甚至出现庸俗化

的现象<sup>[23]</sup>,但它在民众之中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进入 21 世纪以后,大众史学迅速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传播媒体上,由原来的单一媒体传播发展到多媒体传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的介入,为大众史学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形成了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多媒体传播历史知识的局面。二是在撰述主体上,由职业史家书写发展到大众书写。发达的网络成为大众史学书写的一个主流方式,凡是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可在互联网上发言,网上通俗历史写作出现了写手多、作品多、读者多的“三多”现象<sup>[24]</sup>,其中绝大多数写手不是职业史家。三是在目的性上,从教育人向娱乐人发展。大众文化商业化使然,新世纪大众史学出现了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它们考虑最多的不再是如何通过历史知识社会化来提高国民素质,而是如何使人们获得娱乐和放松。四是在学科建设上,由附属向学科独立发展。大众史学如何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作用,如何建设中国自身的公众史学学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初步提出了学科建设的理论框架<sup>[22]</sup>。总之,进入新世纪,大众史学才真正由原来的“通俗”走向了“大众”,形成了独特的对历史的解喻方式,它在历史知识的传播、普及、应用及对民众历史观的影响诸方面,都是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望尘莫及且无法取代的。

### 三

从史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当代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主流史学一统天下到主流史学、精英史学、大众史学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尽管“在史学研究中,继续保持一家独尊的局面,还是真正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sup>[25]</sup>,但令人感到高兴的是,这种分歧的最终结果是多种史学形态共生并存。这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历史知识及历史智慧有着多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说明政治和社会环境逐渐变得宽松,有了滋生多种史学形态的土壤,还说明史学工作者对史学独立、学术自由的追求产生了明显效果。毋庸置疑,不同的史学形态,在历史观、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及对诸多具体历史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很大不同。把意识形态带进历史学领域,对历史进行“权威性”解释,倡导主流历史观念,是任何国家及其统治者都必须要做的工作。精英史家的独立意识及个性特征使得精英史学表现出自己的特性,观点各异,研究理论及方法多样,让人们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解喻历史的多样性。大众史学则有自己

适应社会的独特能力,“大众”从各自的视角传播历史知识,影响民众的历史观,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亦不可低估。

当代中国史学要想得到繁荣和发展,良好史学生态环境的建立必不可少。而要建立更加健康的史学生态环境,三种史学形态必须进行自我反思,主动变革,从而产生更大的活力。

在三种史学形态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失落感最为强烈。这是因为新中国建立后,其他史学形态均被改造,主流史学一直一家独尊。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政治形势及学术风貌的变化,各种史学思潮纷纷崛起,对主流史学形成强大冲击,独尊地位岌岌可危,使之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比如林甘泉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否保持主流地位的问题,他说:“自上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主流,在新世纪中,马克思主义史学还能不能保持自己的主流地位?”<sup>[9]</sup>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他们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主流史学的历史合理性。戴逸认为,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指导作用。”<sup>[26]</sup>林甘泉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海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为‘中共官方史学’,似乎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是靠共产党的政治权力扶持起来的,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首先是由它的科学性所决定的。”<sup>[9]</sup>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新形势下,主流史学必须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诸方面做出调整,自觉迎接挑战。齐世荣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我们应当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样及时吸收、消化各种新理论和新方法……对于它们的‘合理内核’,我们都应予以利用,而决不可采取轻视、甚至排斥的态度。”<sup>[27]</sup>戴逸也说:“有容乃大,我们只有批判地吸收全人类文化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唯我独尊,排斥异己,固步自封……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派和学说,是下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才能够青春常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才能保持强大的生命力。”<sup>[26]</sup>主流史学因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所以容易受政治风向的挟裹,常常会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导致自我迷失和异化。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现象,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进一步摆脱“标签”式的身份认定,以更加开阔的胸襟迎接各类史学的挑战,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危机,走向新的繁荣。“主流地位不是靠政治的强势,不是靠思想上的强迫,主要靠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学者们自身来努力,通过科学的成果来让人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sup>[9]</sup>。

这样的理论反思固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繁荣发展的前提,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使自己发展。对此,李振宏认为,“要允许它自身内部形成不同的学派,允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去解释历史”<sup>[4]</sup>。也就是说,每一个愿意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研究工作的史学工作者都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立的阐释,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逐渐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相互争鸣,这恰恰是主流史学的生命力所在。实际上,在当代中国主流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出现这样的学派,比如“侯外庐学派”。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开创的学术派别,其基本主张是用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强调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唯物史观派”<sup>[28]</sup>。这个学派已经有了三代传人,第一代以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为中心,有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人,代表作是《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代是新中国成立后侯外庐的助手和学生,包括张岂之、黄宣民、李学勤、卢钟锋等人,作品以《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代哲学史》为代表;第三代是侯外庐及第二代学者在“文革”后培养的学生,有姜广辉等人,代表作是《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儒学发展史》等。“侯外庐学派”坚持用历史唯物论来清理中国的思想遗产,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治学宗旨和求实创新的学术风格,有着代有所承的代表人物和学有造诣的代表作。在治学精神上,该学派坚持侯外庐“不苟异亦不苟同”的治学原则<sup>[29]</sup>,因而成为主流史学中特色鲜明的学派。如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史上,学术的分化、学派的形成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规律。马克思主义史学中“侯外庐学派”的出现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说明主流史学具有开放、变革和创新的能力,惜乎这样的学派太少,还不足以形成诸家争鸣的局面。主流史学要想保持主流地位并持续发展繁荣,必须倡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平台上

形成更多新的学派,张扬其思维的个性力量,与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互动。唯其如此,主流史学才能真正敞开胸襟,更好地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精英史学的崛起,一大批史学工作者自觉打破理论与方法匮乏、研究模式与范式单一的历史研究局面,致力于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与利用,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所产出的新成果层出不穷,精英史学逐步蔚为大观。从表面上看,精英史学似乎逐渐疏离作为主流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精英史家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没有为自己设置框框,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模式化、固定化很不相同,他们目光敏锐,勇于尝试任何新理论和新方法。但是,有一个事实不能否认,当代中国的精英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孕育下产生的。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精英史学各擅所长,发展迅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其不再具有笼罩性影响,但是精英史学吸收和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传统和治史精神。唯物史观的自下而上的价值立场、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以及跨学科的治史路数等,都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所有历史研究的流派,精英史学自然也在其中。另外,精英史家不仅仅是一个纯学术真理的追求者,还要有更多的社会担当和政治关怀。因为历史研究的生命力源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作用,剖析社会、唤醒社会和引导社会是精英史学应有的担当。精英史学不要只是为了和主流史学的意识形态化相区分而有意使自己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和民众。杜维明曾说:“与此相应的‘政治之为召唤’则是这一范畴中的一种介入社会的回应,它使现代知识分子参与到公众事务之中,并且以一种超乎哲人和祭司之想象的方式对社会施加深远的影响。”<sup>[30]</sup>精英史学要想对社会施加深远的影响,必须完善自身研究,关注社会问题,进一步彰显自身个性和社会良知。

改革开放以来,精英史学日渐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学术流派渐趋形成,个性化研究日渐凸显。如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刘泽华学派”,这一学派与传统唯物史观区别甚大,他们从“王权主义”角度看待中国思想史,坚持“王权支配社会”,摒弃了传统唯物论的进步与反动、唯物与唯心、社会与阶级、专制与民主等言说体系,从中国古代固有的概念体系出发,提炼形成独特的适合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话语体系。

“有自己的学术个性,有区别于他人的治学宗旨和方法论体系,有独特的言说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一套新的话语体系”<sup>[31]</sup>。这种新的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扩大了思想史研究的视野,使中国思想史研究别开生面。再如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华南学派”,这一学派以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为依托,一批学者将区域史的研究视野与历史学的方法、社会经济史的方法、人类学的方法融为一体,开启了“历史人类学”的学术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史研究流派。“打破传统学科框架,结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从具体而微的地域研究入手,探讨宏观的文化中国的创造过程,是华南研究的主要取向”<sup>[31]</sup>。与此同时,社会史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华北学派”“徽州学派”等富有特色的学术流派。另外,精英史学的个性化特色日益彰显,如杨念群等人的“新社会史”研究、葛兆光的思想史研究、葛剑雄等人的人口史研究等,他们的研究可能还没有形成学派,但却在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独具特色,独树一帜,让人们看到了学术领域五彩斑斓的景象。可以说,这些学术流派和富有个性的研究,既有自己的风格,又具有开放性,它们坚守自己的研究阵地,在赞扬与质疑声中彰显个性特征,在治学理论与方法上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随着学术思潮的变动不断分化或整合,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学术互动关系。这些可能正是当代中国精英史学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为其他史学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大众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孕育、产生和发展既是继承传统的结果,同时又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果,尤其是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现代传媒日趋发达的情况下,民众的阅读、欣赏和文化参与出现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他们不再是历史知识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有了主动参与历史创造活动的激情、叙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冲动和表达历史思想的可能。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电脑、网络等媒体,发表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他们可能并不占有更多的历史资料,也不可能像职业历史学家那样严谨,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对历史的看法却会借助于“亲民”式的写作方式,影响到普通民众。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史学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来自民间的历史观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大众史学为推动历史知识社会化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固然应该给予充分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为了某种经济利益或心理需求,大众

史学领域乱象迭出,内容庸俗、史实讹舛、史观错误、生搬硬造、随意杜撰的现象比较普遍<sup>[7]</sup>。大众史学的作用不是把正确的历史知识贡献给社会,引领整个社会向善,而是一味猎奇,书写严重失范。大众史学似乎变成了娱乐,正逐步消解着人们对历史和经典的“敬畏感”。有鉴于此,大众史学要想健康发展,必须汲取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的严谨治学的精神,提高书写者才、学、识、德等各方面的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及个人负责,以“良史之心”建构大众史学体系,达到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通过历史知识社会化阐释人文理念和人文理想。

当代中国大众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本土自生到中西结合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大众史学基本上传统式的历史知识普及。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Public History”传入中国,开始了中国本土的通俗史学与西方舶来的大众史学的结合。就当下来讲,大众史学的发展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建设。就理论建设而言,时至今日,大众史学在社会领域的实践如火如荼,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发行,电视讲史的持续热播,网络历史作品的层出不穷,历史文化产业的兴旺发达,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都说明历史知识

对民众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大众史学的理论建设却非常滞后,诸如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规范、原则、体系等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论述。理论是学术发展的灵魂,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引,大众史学的乱象就不会得到深刻反思,也不会有发展的后劲。就学科建设来讲,随着本土通俗史学的发展和西方大众史学观念的传入,如何中西合璧,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史学学科,从专业性的眼光观照那些针对社会大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谋划,以便更好地培养社会大众正确的历史意识,提升大众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能力,在当下已显非常重要。这实际上是要求主流史学和精英史学跨界进入大众史学领域,培养相关人才,参与大众历史知识的生产。可以这样说,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促成文化的有序和健康发展,也可导致文化的混乱和机体病变。有鉴于此,史学界必须对大众参与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上的反思,遏制乱象,尽可能为它们营造一个开放的健康发展环境。2013年,上海地区有些高校已经成立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为大众史学学科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 参考文献:
- [1]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瞿林东.坚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创新[M].求是,2000(11).
  - [3]李振宏.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学派、话语与话域[J].学术月刊,2010(11).
  - [4]李振宏.让学术执行批判的使命[J].学术月刊,2009(12).
  - [5]周櫟楷.大众史学的定义和意义[M]//人人都是史家:大众史学论集,第1册.台中:采育出版社,2004.
  - [6]王希.公共史学在美国[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6-10.
  - [7]王记录.近十年来“通俗历史热”现象探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1).
  - [8]陈高华,张彤.20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33.
  - [9]林甘泉,邹兆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J].历史教学问题,2006(3).
  - [10]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11]杨荣国.史学工作者的进步[J].历史教学,1952(10).
  - [12]苏双碧.吴晗自传书信文集[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
  - [13]中国历史小丛书专题合订本将陆续出版[N].人民日报,1983-01-28.
  - [14]邹兆辰,江湄,邓京力.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蒋大椿序.
  - [15]王记录.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误区及其出路[M]//中国史学会.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6-87.
  - [16]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 [17]谢泳.回到傅斯年[J].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10).
  - [18]中国文化创刊词[J].中国文化,1990(创刊号).
  - [19]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20]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3).
  - [21]罗志田.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J].开放时代,2003(5).
  - [22]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J].学术月刊,2012(3).

- [23] 张晓校. 试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通俗史学[J]. 学习与探索, 1997(1).
- [24] 解玺璋. 通俗写史的前途和局限[N]. 人民日报, 2009-03-08.
- [25] 姜义华. 当代中国史学: 从帝王之学走向普遍性的人学[J]. 湖南社会科学, 2008(6).
- [26] 戴逸.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J]. 历史研究, 1998(6).
- [27] 齐世荣. 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历史及前景[J]. 历史研究, 1994(1).
- [28] 方克立, 陆新礼. 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0(2).
- [29] 侯外庐. 韧的追求[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5: 125.
- [30] 杜维明. 杜维明文集: 第五卷[M].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02: 602.
- [31] 程美宝, 蔡志祥. 华南研究: 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实践[J]. 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 2001(22).

## On the Forms, 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ANG Ji-lu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rpose and researching idea,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ntains three main forms, which are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differentiates itself from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in the aspect of the academic standards and discourse system greatly. The former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dependent thoughts and critical spirits while the latter refers to the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ith the distinct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atic historiography discourse system.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takes social demands as the guidance and all the public are involved in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The evolution of the three forms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 roughly, the first stage is from 1949 to 1979 and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dominates the historiography field,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1980 till now and the overwhelming characteristics is that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faces the tests,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grows up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rises suddenly. All of them faces problems during their developments.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must set up different schools on the platform of marxist theories, extend its power of individual qualities, interact with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if it wants to keep its mainstream position.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should expand the areas of research consistently, form academic schools gradually, provide new explanation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history continuously.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has kept rapid development and large influences, meanwhile it needs theory constructions and discipline constructions urgently.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and elite historiography should enter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also, taking participate in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historiography forms; the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the elite historiography; the public historiography; schools

## 王记录教授

王记录，1964年生，河南范县人，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古籍所，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河南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高校教学名师，2012年度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年度人物；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省华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和清代学术史。先后在《史学史研究》《文献》《史

学月刊》《清史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40余篇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登；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黄山书社，2002）、《钱大昕的史学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人民出版社，2009）、《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文献学思想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参撰《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等；主持和参与完成国家级、省部级项目5项；曾获得教育部第五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多次获得河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王记录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多部学术著作被学界称誉。他努力追求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一是注重从思想史的层面入手，考察和总结中国史学史的民族特性和发展演化规律，探究蕴含在中国古文献学具体而琐细的技术操作表面背后的思想本质和特点；二是跳出传统史学单纯以史学文本或史学家作为研究对象、单向探讨史学发展问题的樊篱，打破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史学史一般的研究畴域，从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角度观照学术发展，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探讨传统史学、文献学及学术史的本质；三是从中国传统史学、传统文献学内部固有的表述方式出发，深入剖析并提炼出言说中国史学史、文献学的范畴和概念，以适合中国史学史、文献学研究的话语体系来探讨问题。

